

文汇讲堂

传播人文关怀 汇聚高端名流 讲得通俗易懂 堂中尽情交流

2015年6月13日 总第88-4期(“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历史与我们的未来”第4期) 报名、话题网页:<http://www.whb.cn/zhuhan/jiangtang/>



历史季采编团队：
林秋云、葛君、王婧娅、李云波
整体设计：夏莉佳 视觉音频：李静、赵燕磊

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兴衰



沈志华
主讲嘉宾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研究员、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代表著作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苏联专家在中国》、《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



余伟民(评论嘉宾)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主编《俄罗斯道路：历史与现实》、《冷战是这样开始的：冷战起源专题研究》



林牧茵(特约主持)

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夜线》、《道·理》主持。1994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1998年进入上海电视台；2008和2012年分别从复旦大学国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2012年9月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体与政治、中美新闻教育发展与中美关系研究等。

曾主持《上海早晨》、《新闻报道》等节目。

中苏关系五大热点及看法

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中，有着许多的热点及疑点，各位专家各有见解。

二战结束之后，斯大林是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

现任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新冷战史的领军人物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在他早年的研究中就认为：斯大林从不相信中共真正有能力在中国夺取政权。在他看来，在一个由帝国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共产党若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都不可能取得胜利。鉴于美国军队(而非苏联军队)在中国除东北以外的所有地区几乎无处不在，斯大林相信，如果内战在中国爆发的话，中共便会被击垮。他不希望中共为夺取政权而对蒋介石提出挑战，而是希望中共以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为转移来涉及自己国内的政治活动。根据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同中共打交道的经验，斯大林完全不知道中共是否会听从自己的劝告。结果，在苏联于1945年8月前所进行的外交和军事规划中，中共没有任何地位。

如何看待二战后中苏关系发展初期的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某种分歧？

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专家杨奎松教授认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分歧，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方面或国家利益方面的。毛泽东的不满集中表现在：他认为斯大林早就应该支持他、信任他、帮助他，并且能够平等地对待他。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斯大林就开始频繁地与毛泽东互通信息，交换意见，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看法迅速好转了。照他自己的说法，斯大林从此终于相信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地改善了。

中苏同盟给新中国带来了什么？

首先就是大批来华支援建设的苏联专家。沈志华教授在其《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中指出，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政权的建设，经济的恢复，工业化基础的建立，乃至在中国大地上一度出现的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的形成，都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对于一个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政党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确没有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经验。既要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又要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在中共看来，这是它所肩负的两项并行不悖的历史任务。而要同时实现这两个任务，历史条件留给中国共产党的只有一条路——学习苏联。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苏联派来的专家和顾问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但中苏同盟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上，也深刻影响到了社会文化领域。在建国初期的新中国，不但阅读苏联文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新社会风尚，而且怎样阅读苏联文学即阅读的方式，也别开生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王蒙所描述的1952年由共青团北京市小学教师委员会组织的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讨论。会议讨论的是当时的热门话题——“保尔·柯察金与爱情”，因为如何看待保尔和冬妮娅的关系，已被广泛作为检验读者政治觉悟高低的试金石。虽然名为讨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反对方，像“保尔为什么一定要与冬妮娅分手？保尔为什么有拒绝了乌斯金”的问题，答案都是保尔·柯察金式的：为革命不惜牺牲爱情。结果是，“大家越讨论越理解了保尔·柯察金的伟大，克制与牺牲！”

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究竟何在？

北京大学牛军教授认为中国“大跃进”的失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当“大跃进”运动在1959年夏季已经露出败象后，毛泽东对任何批评显得极度敏感

感，苏联领导人的讲话被他断定为是对“大跃进”的攻击或对人民公社的影射，特别是这些攻击和影射，特别是它们与中共党内的反对意见同时发生，使毛泽东更不能容忍。实际上毛泽东感到他的威望和与威望相联系的权力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庐山会议期间的风波因此被认为是又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它有着与赫鲁晓夫内外呼应的国际背景。总之这种内容复杂且程度严重的危机感与中苏在对外政策、安全战略等方面的一些分歧结合在一起，终使中苏同盟破裂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而李丹慧教授则认为中苏两党和解之梦难圆的症结所在，还应追溯至中共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所做的实质性让步。1956年末1957年初，由于中共帮助赫鲁晓夫和苏共成功化解了波匈事件引起的危机，毛泽东和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上升到基本与苏共平起平坐的位置，中共向国际共运旗手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在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上，为了照顾赫鲁晓夫和苏共的困难，做出妥协，赞成在会议形成的国际文件《宣言》中全面肯定一个党的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大，既而在事实上接受了苏共对内对外纲领政策的核心部分，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纲领路线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遵循的共同准则。会议最终的成果是推出了一个以苏联的方针政策，亦即以赫鲁晓夫的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共同纲领，令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毛泽东如芒在背，如鲠在喉。

对于中苏关系缓和进程的问题，美国学者魏丽莎(Elizabeth Wishnick)认为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缓和趋势给了苏联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少数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相信中苏关系的改善能够加强中国的缓和趋势。尽管在中国发生了这些变化，然而多数苏联外交政策精英坚持认为“没有毛的毛主义”会继续保持优势。

(本版编辑、整理 葛君)

- 在二战结束前的一段时间，中苏之间既没有结盟的愿望，也没有结盟的行动。毛泽东开始曾希望依靠美国的帮助，而苏联最初看重的合作伙伴是蒋介石。而随着美苏冷战态势的逐步发展，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和蒋介石的反苏倾向，才最终迫使斯大林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

到1949年，中共的立场和政策已经确定，此时就根本不存在中共与美国和解的“机会”。

- 中苏同盟的建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是的苏联即将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此斯大林很可能开始考虑重新建立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基地，而朝鲜半岛就是他选中的目标。所以，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中苏之间合作的前景，而是在同盟建立中双方利益冲突的结果。

对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无论军事上成败如何，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毛泽东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力排众议，坚持派兵入朝参战，他此时所考虑的是要弥补斯大林在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对中共的极度不满和不信任，也唯有如此，莫斯科和中苏同盟条约才能真正保证中共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

- 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同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的推动者是赫鲁晓夫。中苏同盟在内部急迫的相互需求中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苏联对中国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大批苏联专家来华为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奠定基础，而中共在波匈事件和苏共六月事件中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则起到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稳定苏共党内局面的作用。

● 苏共二十大并非中苏同盟破裂的起点，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的方针路线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在苏联压力影响下，中共八大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则为日后毛泽东批判苏共二十大埋下了伏笔。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对中苏关系具有标志性意义，《莫斯科宣言》是中苏两党政治合作的经典之作，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机制已经从苏共一党独大变成中苏两党平起平坐，中苏关系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达到最高峰，而中苏之间的分歧也由此发端。

- 中苏之间分歧最初反映在1958~1959年中苏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不合。苏共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心存疑虑，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映，中共在台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做法则令苏共十分恼怒，在赫鲁晓夫访美和美苏关系缓和问题上，中苏之间的分歧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由于此时中共正处于政治上升期，并对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于是这种分歧无法弥合，结果必将导致同盟的破裂。

——摘自沈志华《无奈的选择》

沈志华观点先读为快

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